

罗摩故事文本比较研究之比较

王 浩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我国学者季羨林和蒙古国学者 Ts. 达木丁苏伦在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 分别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中国和蒙古地区的传入、传播途径、影响以及接受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考证, 得出了超越前贤的结论, 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二者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季羨林与 Ts. 达木丁苏伦以其语言的优势, 开放的研究视域, 动用了多种学问, 对多种罗摩故事文本进行了坚实详尽的考证与缜密细致的辨析, 以事实为依据, 为我们找到并展现出罗摩故事在中国、蒙古地区传播的证据。

关键词: 罗摩故事; 比较; 本土化

分类号: I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06)02-0049-06

比较, 就是判明现象之间的异同。比较并不取消所研究的现象的特殊性质; 相反借助于比较, 我们能够判明事物特性。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 对《〈罗摩衍那〉在中国》^① 与《〈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② 做一番粗浅的比较。在比较映照中, 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季羨林和 Ts. 达木丁苏伦在罗摩故事文本中的研究思路。

一、罗摩故事研究的特点

(一) 寻求《罗摩衍那》流传的证据

季羨林在其论文的开头部分, 阐明了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在“印度、亚洲, 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之巨大, 之深入。”同时, 对于《罗摩衍那》是否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问题, 季羨林指出, 过去学者的“对中国影响不大”的观点是片面的。他说, 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于是, “将自己对《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它的影响, 搜集了一些资料, 形成一些看法, 介绍给大家。”^[1] 可以看出, 纠正过去一些片面的看法是季羨林撰写这篇

论文的出发点。Ts. 达木丁苏伦撰写《〈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一文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为编写《蒙古文学概要》第二卷, 1968年 Ts. 达木丁苏伦等人前往列宁格勒大学和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的手稿部搜集史料。他们觅得几本用托忒蒙古文字写成的罗摩故事。这一发现引起 Ts. 达木丁苏伦的高度重视。经过鉴别, 他确定, 作为一种版本的几个副本的这些手抄本故事, 应该是印度著名的民间史诗《罗摩衍那》的蒙古版本。Ts. 达木丁苏伦确信这些托忒蒙古文的罗摩故事文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他说: “尽管学者们知道印度的《罗摩衍那》在中亚、东南亚广泛流传的情况, 但对于《罗摩衍那》究竟是否在蒙古流传过还并不了解。在列宁格勒发现的手抄本罗摩故事就成为了蒙古人曾经了解和传播过《罗摩衍那》的明证”。^[2] 这即是他写作《〈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一文的首要目的。

(二) 使用多语种的各种文本

研究《罗摩衍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传与传播, 必然要求研究者能够读懂原文原著。(事实上研究者不可能掌握各种外语阅读原著, 不得不

收稿日期: 2005-10-15

作者简介: 王 浩(1969-), 女, 吉林省长春市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讲师。

依靠一些译本来进行研究。)季羨林和 Ts。达木丁苏伦懂梵文,他们不需要通过译本来阅读和了解《罗摩衍那》,自己就可以将梵文原著与本民族的各异本进行对比,分辨原著与译本之间的差异,体会出《罗摩衍那》对本民族文学、文化的影响的特点。尤其是季羨林在 80 年代还翻译出版了蚁垤的《罗摩衍那》(全集第 1—7 卷),使这种对比与分析更加深刻。

掌握一门或数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对于比较文学研究则是必备的“知识装备”。在《〈罗摩衍那〉在中国》一文中,季羨林按照汉、傣、藏、蒙、新疆的顺序,分别介绍了《罗摩衍那》在中国传播的状况。用来作对比的主要译本包括:汉文佛经本三个,傣族文本两个,藏族文本一个,蒙古文本四个,新疆的古和闐语本三个和吐火罗文 A(焉耆文)文本一个。文本涉及多达八种语言:梵文、巴利文、汉文、傣文、藏文、蒙古文、古和闐文和吐火罗文(焉耆文)。Ts。达木丁苏伦的研究仅围绕《罗摩衍那》在蒙古民族中的流传状况展开,然而,他涉及的文本语种也有六种之多:梵文、蒙古文、藏文、巴利文、古和闐文、汉文。在论著中他本人整理出版的版本有七种:K 版本、L 版本、M 版本、N 版本、O 版本、P 版本、R 版本,其中 K, L, N, R 版本为蒙古文本, M, O, P 为藏文本。对比的主要文本包括: F. W. Thomas, M. Lalou, J. K. Balbir 等英、法、澳大利亚的学者结集出版的六种藏文本版本(A, B, C, D, E, F)以及他自己整理的四种蒙古版本(K, L, N, R),共计十种。

我们不妨列举一下季羨林与 Ts。达木丁苏伦共同使用过的文本:蚁垤的《罗摩衍那》梵文原著、巴利文本、H. W. Bailey 的古和闐语残卷、敦煌发掘的藏文本、蒙古文本。其中的蒙古文本是 Ts。达木丁苏伦提供给季羨林的。能够为国际学界对《罗摩衍那》的研究尽一份力,恐怕也是 Ts。达木丁苏伦出版该论著的一个初衷。

(三) 开阔的研究视域

季羨林多年致力于印度史诗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罗摩衍那初探》、《〈罗摩衍那〉在中国》、《罗摩衍那》等多篇论文论著以及《罗摩衍那》的中文译著。他的研究涵盖了《罗摩衍那》的性质和特点、成书的时间和地点、语言和诗律、与《摩诃婆罗多》的关系、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在印度国内外的影响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考察《罗摩衍那》

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季羨林能够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审美心理,从整个影响接受来研究探讨,获得了有关中国罗摩故事的清晰可信的流传变异规律。他不仅考察了罗摩故事对于文学的影响,还考察了其对于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渗透。

Ts。达木丁苏伦对印度文学有着一定的修养,多年来致力于蒙、藏、印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在探讨《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问题时,他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于蒙古地区,而且还注意到《罗摩衍那》在南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其他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东南亚诸国的文学都受到《罗摩衍那》的巨大影响,而且就其传播的普及程度而言,也并不比其原产国印度差。柬埔寨和缅甸至今还有从公元 7 世纪遗留下来的《罗摩衍那》中某些英雄的塑像。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平民戏剧、舞剧都有着取材于《罗摩衍那》,然后发展而来的历史。在中亚的和闐城附近找到了大约创作于公元 9 世纪的《罗摩衍那》的东伊朗(索格狄亚那)版本”。^[2]他甚至还提到了我国的长篇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以哈努曼的形象为原型创作的。^③

Ts。达木丁苏伦开放的视域还表现在有关《罗摩衍那》对于蒙古民间文学、信仰以及思想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影响的探讨上。经 Ts。达木丁苏伦考察,“《罗摩衍那》已经渗入到蒙古的神话传说之中。在西藏和蒙古广泛流传着关于北方天国香巴拉(Shambal)的神话故事。在这个神话中,香巴拉王的参谋(大臣)的名字就叫做哈努曼或哈努曼塔。不仅名字是相同的,哈努曼将军的事迹也与《罗摩衍那》中的哈努曼猴子的事迹非常地相似。”^[4]罗摩故事在蒙古流传的过程中,它的情节母题逐渐渗透到蒙古民间故事之中。季羨林在分析傣族的罗摩故事时,对云南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或民间文学中遗留的罗摩故事痕迹进行了研究。

Ts。达木丁苏伦不但考察了罗摩故事在蒙古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他的视线还触及到蒙古人的信仰、精神和思想等方面。由蒙古寺庙常常见到供奉猴子的画像;蒙古的经书典籍中关于怎样请猴、怎样祭猴以及怎样求猴满足什么愿望的异常丰富的记载以及民间对猴子的崇拜, Ts。达木丁苏伦推测出这种崇拜“无疑是受到了印度的影响,而且还是源于《罗摩衍那》的主人公之一的哈努曼猴子的影响。”^[2]同时, Ts。达木丁苏伦发

现罗摩故事业已渗入蒙古人民的精神思想之中。他说：“《罗摩衍那》在广大人民中普遍流传，给予人们的信念就是相信来世将会是圆满的、幸福的时代这一美好的信念和乐观主义。”^[2]

季羨林总结罗摩故事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条规律，就是“罗摩故事传入中国以后，各族都加以利用，为自己政治服务。”^[1] Ts。达木丁苏伦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说：“众所周知，喇嘛们、宗教活动家们一直以来不断地想方设法利用着这个神话故事。为了提高宗教活动家们的声望，他们宣称西藏的班禅喇嘛的来世将成为香巴拉王，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就是香巴拉战争中的哈努曼达将军，并到处传播写有供奉和颂词的经卷。”^[2]这说明罗摩故事在蒙古地区进行传播时也曾遵循着这条规律。

(四)运用多种学识

季羨林与 Ts。达木丁苏伦在各自的论著中，都动用了多种学问，进行了坚实详尽的考证和缜密细致的辨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位学者对于罗摩故事传播路线的考察为，进行探讨。

季羨林从在福建泉州寺庙里发现了猴子浮雕这一普通的事情中，开展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途径的新探讨。他说：“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大都认为中印文化交流渠道只有西域一条，时间都比较早，也就是说在唐宋以前，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必须加以纠正；中印文化交流从时间上来说，宋以后仍然有比较重要的交流。从空间上来说，宋代海路才大为畅通。此外，还有一个川滇缅印道，也往往为学者所忽略。”^[1]

Ts。达木丁苏伦在考察罗摩故事流传至蒙古的路径与年代时，则是动用了自己的语言能力、文化知识。他由 K 版本中存在着相当多的藏文词汇没有被译为蒙文，而是仅仅用蒙古字母拼写出这些词汇的读音，推断出 K 版本译自藏文。^①进而，从 K 版本中常常会遇到西部蒙古卫拉特的大量词汇，推测出这部传记不是按照形成的常规那样从畏兀儿蒙古文转写成托忒文字的，而应该是按照西部蒙古的方言，用托忒文字从藏文直接翻译而来的文本。^②又因所找到的 K 版本的所有手抄本均是用托忒文写成的，进而提出：“这部译著是在创制卫拉特托忒文的 1648 年以后才翻译完成的”的看法。最后，Ts。达木丁苏伦得出“K 版

本应该是在 18 世纪前后由藏文翻译而来的”结论。

二、罗摩故事的比较研究

《〈罗摩衍那〉在中国》与《〈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的研究思路是一致的，都是旨在寻找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流传及其影响接受与变异创新的研究。这两部论著的研究手法相同，即通过比较，寻找各文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可以说，他们都是典型的影响研究。

季羨林的论文首先根据梵文原作译介了《罗摩衍那》的基本故事情节，接着按照汉、傣、藏、蒙、新疆的顺序，将自己搜罗到的“中国境内的各异本”与之对比，主要针对文本的主题思想（性质）、故事内容、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比较，一一辨析它们的异同及其变异原因，最后总结概括《罗摩衍那》在中国传播的规律。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季羨林与 Ts。达木丁苏伦却是各有千秋。他不仅将《罗摩衍那》全书的骨干故事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分析，而且将《罗摩衍那》中插入的许多零碎的小故事，包括寓言和童话作为底本。譬如，在分析《罗摩衍那》遗留在古代汉译佛经中的痕迹时，他分了两个步骤来阐述，先是在汉译佛典中找到两个同《罗摩衍那》骨干故事相当的故事，与蚁垤的《罗摩衍那》进行比较，加以分析。而后在汉译佛典中选取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小故事与《罗摩衍那》穿插的小故事比较对照，分析其异同。而在分析新疆古和阗语文本时，季羨林根据 H. W. Bailey 的研究成果，将故事的内容简略地叙述。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脚注的方式，将考证及对比分析结果附上。最后，综合对《罗摩衍那》在五个民族中的流传情形的分析，探讨出《罗摩衍那》在中国传播的情形。

Ts。达木丁苏伦根据《罗摩衍那》在蒙古流传的自身特点，采取更加适合于研究蒙古文罗摩故事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鉴于罗摩故事文本在蒙古地区发现较晚，且是 Ts。达木丁苏伦本人亲自发掘出来的，在对蒙古文罗摩故事展开具体研究和分析工作之前，Ts。达木丁苏伦对搜集到的同一文本的不同手抄本，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和鉴定工作。接着将整理的七种文本与蚁垤的《罗

摩衍那》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与蚁垤的《罗摩衍那》,“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而得出“蚁垤所著的《罗摩衍那》好像并没有以专门的书的形式在西藏和蒙古地区流传过。似乎可以说,这些西藏和蒙古罗摩的故事并不是从蚁垤的《罗摩衍那》传承衍生而来,而是在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的时期(16世纪前后),伴随着数目庞大的佛教经典一同经由西藏地区传入蒙古”^[1]的结论。

既然它们与西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下一步 Ts。达木丁苏伦遂将蒙古文本与藏文本进行对照分析。在上述七种文本中, M, O, P 三种为藏文本。据 Ts。达木丁苏伦考察,他们比起其它四部蒙古版本,就内容而言,没有更多的信息,因此不打算将他们列入比较研究范围之内。在没有获得藏文原文的情形下, Ts。达木丁苏伦选取英、法、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在敦煌获得并结集出版的六种版本为比较对象,将它们与自己整理的四种蒙古版本进行比较研究。

在具体比较蒙藏罗摩故事时, Ts。达木丁苏伦沿用了 J. W. de Jong 提出的分类体系,即以 J. W. de Jong 归纳的藏文本 46 条中的每一条作为比较对象,将 K, L, N, R 版本的内容与其进行比较,在每一条之后指出该条是否在蒙古版本中出现,是否发生变异。这种研究方式反映出 Ts。达木丁苏伦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比较研究的一贯作风,这也正是 Ts。达木丁苏伦比较研究的特色之一。

此外, Ts。达木丁苏伦在对罗摩故事的各种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时,除了在蒙古罗摩故事与蚁垤的《罗摩衍那》之间、蒙古罗摩故事与藏文罗摩故事之间进行比较对照之外,还注重在蒙古罗摩故事之间的比较鉴别。这种比较分析有两个目的,一方面, Ts。达木丁苏伦试图复原蒙古文罗摩故事全文,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对比分析,发掘出蒙古文本中比藏文本中所蕴含着的更多信息,以此找到对蒙古文罗摩故事再创作或再加工的证据。

三、罗摩故事的本土化研究

季羨林和 Ts。达木丁苏伦关于《罗摩衍那》传播的研究,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非常关

注《罗摩衍那》或罗摩故事在本民族、本地区发生的变异及其本土化方面的考察。

季羨林在对比《罗摩衍那》与汉译佛经《六度集经》中的睽子的故事时,提出了“《罗摩衍那》的故事是一个悲剧,童子死掉,其父发出诅咒。而在《六度集经》中则转化悲剧为喜剧。童子得群神福佑,死而复生,皆大欢喜。这是否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心情而改变的,不得而知”^[1]的问题。在比较梵文《罗摩衍那》与傣族《兰嘎西贺》时,他得出的结论是:“傣族的故事大大地傣族化了,也就是中国化了。”^[1]他认为中国化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好多印度地名都换成了中国地名,也就是云南本地的地名。比如阿努曼丢下来的仙草山,就落在云南傣族地区”^[1];二是“有不少本地民间故事窜入整个故事之中”^[1];三是“故事的第五部分,召朗玛与勐哥孙之间爆发战争,故事就发生在傣族地区,这已不仅是中国化了,而是中国创造了。”^[1]在分析敦煌的藏文本与梵文本时,季羨林指出藏文本有些地方本土化了,如“藏本创造了一个大黑天(实际上就是毗湿奴),与大梵天相对立……藏本把一些名字改变为本地的。结尾是大团圆,与梵文本异。西藏人同其他中国各族人一样不喜欢悲剧。”^[1]季羨林指出蒙古文本的本土色彩浓厚,但例证主要是引用 Ts。达木丁苏伦的研究,此处不做赘述。最后,季羨林总结出《罗摩衍那》在中国流传的五条规律:一是“《罗摩衍那》的影响完全是在印度教方面。然而罗摩故事传到国外以后,大概是由于都是通过佛教传出来的,所以国外的许多本子毫无例外地宣传的都是佛教思想。”二是“罗摩故事传入中国以后,各族都加以利用,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三是“汉译本特别被强调伦理道德的一面。”四是同古希腊相比,“中国人不大喜欢或欣赏悲剧”,因而,罗摩故事在印度是一个悲剧,“但到了中国却多被改成喜剧结尾,以适应中国人的心情和爱好。”五是都被“涂上了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1]其中后四条都涉及到了《罗摩衍那》的本土化问题。

Ts。达木丁苏伦的有关罗摩故事本土化研究主要集中在 L1 和 K 版本上,着重就译者对原文的变动;蒙古文罗摩故事中所蕴含的译者、读者、作者心理个性及思维方式;所呈现出的蒙古社会时代背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在分析 L1 版本时, Ts。达木丁苏伦认为,补

充有关楞迦岛、罗波那、吉罗婆山的解释；将“用火漆(封蜡)建造的房子”改为“用木头建造的房子”^[2]等均是译者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以蒙古读者所能接受的内容和表达形式进行的变动。译者对本文的删节、更改、增补和释义是蒙古文罗摩故事的本土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考察《供养汗传》(K 版本)时, Ts。达木丁苏伦有这样一段话, 耐人寻味:

从这部译著中的某些部分可以看出蒙古译者的思维方式。举例来说, 此版本中写道: 罗摩在追逐金鹿时, 翻越了九道山梁, 渡过了九条江河, 跋涉了九条溪流, 穿越了九道峡谷, 驰骋了九座平原。这种描写在蒙古民间文学的神话故事中是非常丰富的。又如, 描写金翅鸟挡住恶魔罗波那去路的部分则可以让人联想起在蒙古戈壁上旅行的情景。当写到恶魔罗波那劫掠悉多, 在天上疾飞时, 译者用自己特色的思维方式描写道:“(如果挡得时间长了)旅行者如果走的时间长了, 所带的粮食, 就会消耗净尽, 马匹就会疲倦”。这里译者把恶魔罗波那的行为比喻为戈壁旅行者食物耗尽, 骑乘的马匹疲倦的样子。4 经过蒙古文罗摩故事本土化方面的探讨, Ts。达木丁苏伦得出:“蒙古的 K 版本是迄今为止找到的藏文文本的译作。或者说是增加了, 蒙古化的文本; 蒙古 L1、L2 版本是以藏文 M 版本为依据的蒙古地方化的一种版本。”^[3]

可见, 两位学者的罗摩故事本土化研究, 都是从本国或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角度, 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体裁样式、情节、细节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异进行的考察。然而, 我们发现, 两位学者的本土化研究略有不同。他们的出发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季羨林的本土化研究主要是为了阐述《罗摩衍那》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 发生了变异, 已经中国化了, 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Ts。达木丁苏伦不仅阐述了罗摩故事蒙古本土化的事实, 而且强调对这一事实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他在论文的第二章“这里出版的蒙藏罗摩故事的研究状况”中, 在考察分析“最具有蒙古特色的察哈尔格西鲁布桑楚勒特木的”注释本 L1 版本时, 又一次指出:“把藏文学作品蒙古化或是改成蒙古式样是蒙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把外来事物转化为自己的, 把外来文化遗产转化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2] 我们可以看出, Ts。达木丁苏伦是从蒙古文学整体研究的

角度思考蒙古本土化的问题, 或者说是从书写蒙古文学史的角度, 进行蒙古本土化研究的。因而, 他在罗摩故事的研究过程中格外注重对他们进行本土化的考察, 并将有关蒙古罗摩故事的研究成果写入《蒙古文学概要》第二卷。

Ts。达木丁苏伦始终从蒙古文学研究的视角思考文学现象的结果, 往往能够发现为别人所忽略的一些问题, 得出一些独特的看法。如在探讨罗摩故事的佛教性质方面, 季羨林曾归纳道:“《罗摩衍那》宣传的是婆罗门教, 以后的印度教。巴利文《十车王本生》宣传的则是佛教思想。佛教在印度后来消失了, 只剩下印度教的一统天下。《罗摩衍那》的影响完全是在印度教方面。然而罗摩故事传到国外以后, 大概是由于都是通过佛教传出来的, 所以国外的那许多本子毫无例外地宣传的都是佛教思想。”^[1] 在具体分析蒙古罗摩故事时, 季羨林说:“总起来看, 蒙古文罗摩故事, 与中国其他地区相同, 是宣传佛教的。整个的 Jivaka 故事是一个本生故事, 故事中的罗摩就是释迦牟尼本人, 而且有两处提到除邪信佛。在前世中, Jivaka 王曾在海岛上遇到除邪信佛。在 Jivaka (等于十车王) 故事中, 罗摩当了国王以后, 又请除邪信佛来传经说法。佛教色彩应说是非常浓的。”^[1]

Jivaka 王的故事(即《十车王传》)就是 Ts。达木丁苏伦注明的 K 版本。在对于 Jivaka 王故事性质的考察上, 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出入。Ts。达木丁苏伦在经过与其它文本的比较后, 提出了“与其它版本的《十车王传》相比较而言, K 版本所受到的佛教影响甚微”^[3] 的看法。原因如下:

a、首先, 膜拜喇嘛和文殊菩萨。

b、需要注意的是, 古代印度人普遍认为, 因为 Jivaka 王在前世抛弃了自己的妻儿, 成为比丘僧, 令妻儿伤心。于是心生抱怨的妻儿发下“让他来世没有子嗣”的毒咒, 所以供养汗今世就没有子嗣。

c、Jivaka 王在大海上(也有可能是在海岛上)遇见了除邪信佛, 礼毕听其讲经, 并将除邪信佛请回家乡。

d、Jivaka 王遇到了一万名渔夫, 讲经布道以示杀生之罪孽, 阻止他们捕鱼杀鱼。

e、最后, 指出罗摩汗是佛祖的前世。^[3]

Ts。达木丁苏伦认为, “K 版本中所受宗教的影响就集中在上面这五句译文之中。除了其中两

句之外,其它的几处皆与原故事中的事件和情节完全没有关联。”^[4]他进一步指出:“在K版本中,只是在并不破坏原著结构的基础上,嫁接了几处具有宗教色彩的译文,从而用这种方法限制了宗教的影响。”于是,Ts.达木丁苏伦得出:“K版本是篇幅宏大、艺术描写最多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传记之中并不是通篇都渗透了佛教的思想,它只是在表面上被涂上了一层佛教色彩或只是在某个地方有些零星的佛教内容而已”的结论。这也是他从蒙古文学研究角度考察罗摩故事的结果。

经过上述的对照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季羨林与Ts.达木丁苏伦以其语言的优势,开放的研究视域,动用了多种学问,对多种罗摩故事文本进行了坚实详尽的考证与缜密细致的辨析,以事实为依据,为我们找到并展现出罗摩故事在中国、蒙古地区传播的证据,就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在中国、蒙古地区的传入、传播途径、影响以及接受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结论。

注释:

①1984年季羨林撰写了《〈罗摩衍那〉在中国》一文,1986年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上,1991年编入《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中。

②Ts.达木丁苏伦将用俄语写成的《〈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译成蒙语,于1976年在乌兰巴托出版。当时,适逢第三次国际蒙古学大会召开之际,Ts.达木丁苏伦将此书献给大会。1979年,俄文版的《〈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也在莫斯科正式出版发行。

③季羨林也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至少有一部分有《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影子,《罗摩衍那》在这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详见季羨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④例如:карга(藏语为mkhar ba),意为“青铜”、“雪”,сэлэ сагадам(藏语为sale sbram),意为“纯金”,дом(藏语为dom),意为“熊”,ладу(藏语为ladu),意为“油炸点心”、“烘烤点心”,等等。

⑤例如:zangi(mede,意为“消息”),naij nar(ekhner,意为“妻子”),khot(khodood,意为“胃”),zemnel(omog, bulglesen tsereg,意为“保护,护卫军”),tanaa(khamriin ugalz,意为“鼻翼”),等等。

参考文献:

[1]季羨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蒙古]Ts.达木丁苏伦.《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M].乌兰巴托,1976.

【责任编辑 额尔敦哈达】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amayana Story Texts

WANG Hao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of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mount of original materials Chinese scholar Ji Xianlin and Mongolian scholar Ts. Damdinsuren respectively studied the introduction, diffusion, influence and acceptance of Indian epic Ramayana in China and Mongolian. They made epoch-making conclusion and gained prominent consequenc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By investigating the features of studies on the Ramayana stories,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Ramayana stories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Ramayana stories, the article hackles and studies the thoughts and techniques the two scholars used during the studies of the Ramayana stories, in order to bested the research on the Ramayana stories and Mongol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Key words: the Ramayana stories; comparison; localization